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中国学术思想散论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SANLUN

侯宏堂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中国学术思想散论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SANLUN

侯宏堂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李克非 刘 佳
装帧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散论/侯宏堂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三辑)
ISBN 978-7-5676-3323-0

I. ①中… II. ①侯…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5030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散论

侯宏堂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4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3323-0

定 价: 6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有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

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主办1种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奉献的是第三辑，文集作者既有年高德劭的退休老师，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学科领域涵盖中国文学、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等，大

致可以反映文学院学术研究风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新变。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目 录

阴阳学说与传统宇宙观念研究

阴阳观念起源新探	3
阴阳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意蕴	27
阴阳学说与中国人的宇宙观	46
“天人合一”观早期发生历程	63

中国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

论阴阳辩证思维及其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影响	77
内向思维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主体精神	96
试论朱熹《诗》说的美学意义	109
宗白华中国美学研究的三大贡献	149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践论美学的自我反思	171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读朱良志“中国艺术研究系列”	195

宋学诠释与现代学术思想研究

陈寅恪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217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243
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282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 ——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312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339
后 记	357



阴阳学说与传统宇宙观念研究

阴阳观念起源新探

源远流长、意蕴丰富的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中国传统哲学独具特色的主要范畴如“道”“太极”“气”和“五行”等无一不与“阴阳”紧密相联。诚如成中英先生所言，“阴阳”是中国哲学中最为根本的形上学范畴，阴阳学说是中国哲学中最早出现也最为根本的学说。^①三千余年来，中国历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发过阴阳学说，阴阳广泛地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风貌、基本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朴先生说得很道理：“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弥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②而和五行相比，阴阳更为根本，五行以阴阳为其基础。^③因此，深入研究和阐发阴阳学说，对推进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治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要准确把握和深入研究阴阳学说，首先应当对阴阳观念的起源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and 了解。这个问题又内在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阴阳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二是阴阳观念为什么会源于中国并在中国历久而不衰。本文便是对这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初步考察。

①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137页。

②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③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301页。

一、阴阳观念产生的三个基本来源

阴阳观念的起源问题，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扰的理论难题，它像谜一样地横亘在今人的面前，吸引着现当代学者不停地去探索和破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以为起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或以为起源于《周易》，或以为起源于生殖器官的崇拜，或以为起源于“十月太阳历”，或以为起源于枚占方式，或以为起源于巫术活动之动静两态，等等。学者们探讨得更多的则是《周易》阴、阳爻符号（--、—）的起源：或以为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或以为是龟卜兆纹的演化，或以为是古代用于占筮的两种竹节的象形，或以为是上古“结绳”时代“有结”“无结”的形态，或以为是数字卦奇、偶得象征，等等。这种种猜测和解说都难以令人信服和满意，因为“自然取象”说流于笼统，“生殖崇拜”说和“枚占方式”说、“巫术两态”说失之片面，“《周易》”说和“太阳历”说以流为源；而阴阳符号的起源又不等于阴阳观念的起源，阴阳符号的探源侧重于形式或形象，且阴阳符号形成之前朴素的阴阳观念早已存在；并且这些观点都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阴阳观念源于中国而又为中国所独具，在中国历久而不衰。尽管如此，这些观点还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因为不同的学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阴阳观念的本质是对种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事物或现象的抽象概括，阴阳观念本于古人对自然万物两极对待现象的直接观察和体验。需要进一步指出和强调的是，阴阳观念的诞生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从具体两极对待现象的观察体验到阴阳观念的抽象概括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阴阳观念是中国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通过不懈地观察、体验和思考而逐步形成的。

那么，中国的阴阳观念究竟起源于古人对什么样的具体现象的直接观察和体验呢？这要追溯到远古初民的生存状态。众所周知，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即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古人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

记·礼运》)。原始初民为了维持个体生存、延续个体生命，必须获取食物、衣服、住所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为了传宗接代，延续和发展人的群体生命，必须生儿育女。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两种生产：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这两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大支柱，是关系人类存亡的大事，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生活资料的生产使人类不得不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人类自身的繁衍使人类不断地对自身进行思考。但是在远古时代，初民们征服自然的能力低下，他们对“两种生产”的结果无法把握，时时会碰到暂时无力克服的天灾人祸和无法逾越的障碍难题；同时，他们的思维比较简单、混沌，对自然现象的变化迷惑不解，且往往把自己与自然混同起来，把自然物人格化，认为与自己相关的自然物也有灵魂，认为有许多鬼神在左右自己的命运。于是他们远观自然，近察自身，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幻想自己具有超人的力量而主宰自然，企望神迹以求成功，这样就产生了原始崇拜和巫术活动。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到原始崇拜和巫术思维构成了早期人类认识和思维的重要形式，也构成了原始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以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几类。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中国先民正是经过原始崇拜和巫术活动等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和发展。古老的阴阳观念由具体现象而抽象概括形成之时，也正是原始崇拜和巫术活动较为发达的年代。具体地说，中国先民的阴阳观念产生于太阳神崇拜、生殖崇拜和筮占活动三者交融盛行的殷周时期。

① [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一) 太阳神崇拜

远古初民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为了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观察、体验、思索着周围的大千世界，寻觅着可以直接或间接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东西，而高悬在天空中的抚照万物的一轮金光灿灿的大火球，无疑是最容易引起初民注意观察的对象，也是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自然物。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感受到昼夜、作息、阴晴、明暗、冷暖等差异的交错变化，并进而体悟到这些差异与天上那轮大火球密切相关，体悟到万物生长靠那轮大火球，大火球发出的光和热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这样无疑会使他们更加关注大火球的运行情况，猜想它的无穷威力，于是便产生了关于太阳的崇拜活动。

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过太阳崇拜，流行着许多有关太阳的神话，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尤其如此。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中，即发现有太阳神崇拜的遗迹（最早太阳神形状是太阳形状）。如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现有日月纹和日月山纹；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双鸟朝阳雕像；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众多的圆圈内“+”形及其变体“x”“*”形和“卍”形图像，而“+”字形图案在北美印第安人和欧洲青铜器时代均象征太阳。古文献如《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郑玄注云：“天之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孔颖达疏云：“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日居群神之首，故云日为尊也。”“天之诸神，唯日为尊，故此祭者，日为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此外，《诗经》《左传》《周礼》等的有关记载，也表明上古时代确有迎日、拜日的正式礼仪。但直接记载太阳神崇拜的最早文字记录是殷墟卜辞。郭沫若曾根据卜辞材料，断定殷商人每天早、晚均有迎日出、送日入的礼拜仪式。陈梦家也曾根据卜辞指出，殷人所祭者是“日，出日，入日，各（落）日……祭

之法曰宾、御、又、权、岁等等，也都是祭先祖的祭法。”^①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可知，上古时代的中国曾广为流行对太阳神的崇拜，并且中华先民不仅把太阳当作自然神来加以敬奉和崇拜，而且多把太阳当作图腾来加以信仰和崇拜，视太阳为自己的祖先和保护神。“这些崇拜太阳神的部落也许来源于同一个祖系，也许并非来源于同一个祖系，但他们都把太阳神看作自身的始祖神，并且其酋长常有以太阳神为自己命名的风俗。”^②据何新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羲—太昊—高阳—帝俊—帝喾—黄帝，实际上都是同一个神即太阳神的变名。”^③

关于此，我们不妨再作些说明。一般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可以一分为三，即东夷、华夏和苗蛮三大部落集团。这三大部落集团中最古老的图腾即原生态图腾多为太阳。东夷部落集团的代表部落是太昊、少昊。“太昊”之“昊”，日在天上，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夷人奉太昊为祖宗，就是说他们自认为是太阳的子孙或者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产生出来的。太昊之后有少昊，“少昊”之“昊”释义相同。准此，我们认为东夷部落集团的原生态图腾是太阳。华夏部落集团的代表部落是炎帝、黄帝。“炎帝”之“炎”，《说文解字》言：“火光上也，从重火。”二火相重，火在火上，有火光热气上腾之意。从词源学来看，炎帝与火密切相关。《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这一氏族大概是发现火的功能较早的氏族，并善于取火和保留火种，所以对火顶礼膜拜，自认为是火的后代。可见炎帝族的原生态图腾应当是火。而在原始初民看来，火与太阳无太大差别，所谓“夫日者，天之火也”（王充《论衡·说日》），因为太阳就是一个大火球，太阳与火都能够发光发热。因此，可以认为炎帝就是起源于太阳神崇拜，此即“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义·五行》）。我们再从帝尧入手来看黄帝。传说中的尧是黄帝的后代。《尚书·尧典》尧制历法神话记载，远古女性太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3—574页。

② 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③ 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阳神“羲和”被帝尧分解为“羲”“和”两个族姓四位兄弟“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并分别派往东南西北四个极边去观测太阳的方位，以便按照自然运行的秩序去建立社会生活秩序。其中还记载了春天日出祭礼和秋天日入祭礼等祭日之礼。可见，帝尧族的太阳神崇拜非常盛行。而帝尧的祖先更是远古太阳神所演化而来，“黄帝同尧帝一样，皆从远古太阳神崇拜演变而为人间古帝王”^①。苗蛮部落集团中的最重要的氏族是三苗氏，而“三苗氏的原生态图腾当是太阳”^②。据《墨子·非攻下》记载，“三苗大乱”之时，“日妖宵出”。意思是说，三苗氏将要遭遇灭族的命运的时候，图腾祖先太阳由于不安而反常，在夜间出现。所以说三苗氏的原生态图腾是太阳并非没有依据。可见，中华民族的祖先存在着太阳崇拜的普遍现象。

由于对太阳的崇拜、关注与观察，中国原始初民经常会发现一系列明显的两极对待现象：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每天傍晚在西方落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太阳的时候感到温暖，没有太阳的时候感到寒冷；有太阳的时候光明，没有太阳的时候黑暗，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这些两极对待现象的反复观察与体验，使得初民们产生了两极对待的观念：天与地，东与西，升与落，上与下，昼与夜，明与暗，醒与睡，晴与阴，暖与冷，夏与冬，早晨与傍晚，劳作与休息，运动与寂静，干燥与潮湿，等等。而所有这些两极对待观念的产生和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都是源于太阳的循环运行，源于初民们太阳观察所得到的启示。可以说，正是由于太阳的运动，引起了客观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两极对待现象；正是由于对太阳的崇拜与观察，使得原始初民形成了关于自然现象的两极对待的观念。这样的一系列的两极对待观念蕴含着抽象概括成阴阳观念的潜在必然性，当两极对待观念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并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激发之时，就会形成阴阳观念。可见，太阳神崇拜在阴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着

①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② 龚维英：《原始崇拜纲要——中华图腾文化与生殖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奠基的作用，太阳与阴阳观念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也可以从字源学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在中国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中，阴字尚未被译识，阳字的字形右边像红日高照，左边象征旌旗飘扬。金文中，阴字的字形取荫蔽而不见阳光之意，阳字则与甲骨文类同。《说文解字》云部云：“黔，云覆日也。从云，今声。会，古文黔省。”《说文解字》勿部云：“易，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貌。”《说文段注》云：“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会易废矣。”《说文解字》阜部云：“阳，高明也。从阜，易声。”梁启超有言：“会为云覆日，此其本义；引申为凡覆蔽之义。覆蔽必暗，因又引申为暗义。”“易从日从一者，日在地上，即日出之意。从勿者，《说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日出地上而建旗焉，气象极发扬，此其本义。引申以表日之光彩，故日称太阳，朝日称朝阳，夕日称夕阳。日出则暖，故又引申谓和暖之气为阳气。向日乃能见阳光，故又引申为正面或表面或南方之义。此阳字字义变迁之大凡也。”^①根据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文献可知，《说文解字》对阴、阳二字的释义以及梁启超的解说是大体正确的。总之，阴阳二字的本义是与“太阳”紧密相关的。诚如徐复观先生所云：“‘阴阳’二字，是由会易二字孳乳出来的。虽然阴阳二字行而会易二字废，但以后一切有关阴阳观念的演变，都是由与日光密切关系的会易二字之原义引申演变而出，大概是没有问题的。”^②

（二）生殖崇拜

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原始初民在观察和探索外界自然的同时，也对自身进行不懈的观察和思索。其中他们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是有关生命的来源、存在和延续的问题。原始初民生产力极为低下，生产工具极为简陋，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生存能力差、存活率低、寿命短，物质资料的生产需

^①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344页。

^②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3页。